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世纪之交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1-24

[作者] 赵先权

[单位] 传媒学术网

[摘要] 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生活就不仅仅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真实的“记录”。从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生活本身更深刻的故事与形象，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并由此认识某个时代。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与真相，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就成为历史的符号。新闻报道不如文学的描绘那样可以全景式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却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更加广泛、快捷地传递信息、影响舆论、整合行为，本身已经成为社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闻事业的魅力就在于此时此刻的“立竿见影”，满足人们当前的需要。

[关键词] 新闻事业;新闻报道;大众传播媒介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是对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评价，也表明了文学的价值之所在。那么，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生活就不仅仅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真实的“记录”。从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生活本身更深刻的故事与形象，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并由此认识某个时代。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与真相，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就成为历史的符号。新闻报道不如文学的描绘那样可以全景式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却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更加广泛、快捷地传递信息、影响舆论、整合行为，本身已经成为社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闻事业的魅力就在于此时此刻的“立竿见影”，满足人们当前的需要。同时，其遗憾与缺陷也难以避免，在全面性和深刻性这些方面往往逊色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其他领域。在过去的100年间，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相辅相成，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概而言之，我们不妨如是说：一、新闻要有激情就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来看，唤醒民众、鼓吹变革、兴利除弊、激浊扬清，新闻的作用可谓大矣。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闻事业总是成为急先锋，许多富有激情和战斗精神的新闻人本身就是时代骄子，比如王韬、梁启超、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邹韬奋等人，都是个性鲜明的名家，有的还为推动社会进步献出了生命，不仅在新闻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都英名永存。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其新闻实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风起云涌、激荡人心，天下响应。其中，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就很突出，是革故鼎新的最强音。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他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创刊宣言》，仍然可以感受到那澎湃的激情：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

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才是真理，在对方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国际的强权，追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什么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此文言辞犀利、感情充沛、文采斐然，堪称中国新闻史上“报刊政论文”的典范之作。言论，作为新闻作品中的重要武器，在对舆论的影响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急剧变革年代如此，和平发展时期也是如此。当然，时代不同，“激情”的内涵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青年毛泽东的激情，是埋葬一个旧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的激情；我们今天的激情，是对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是对改革的呼唤与宣扬，是对腐败现象的揭露，是对社会不良倾向的监督，是对党和人民利益的维护。新闻报道与新闻言论如果失去了这种热情与激情，就会平淡无奇、难以调动和疏导社会情绪。

二、新闻要有理性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新闻的“煽情”，在特定时期容易出现偏差、失去理性。比如，“大跃进”以及十年“文革”期间，新闻也陷入了狂热，大放“卫星”，大放厥词，昏话连篇，甚至成为林彪、“四人帮”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个历史教训是不能忘却的。同时，新闻要有立场，不能盲目“跟风”、凑热闹。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新闻一度成了“有闻必报”、“有闻必录”纯客观主义的载体，实际上对社会动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教训也是很深的，如果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自己却否定党的领导，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新闻在“度”上的把握，既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要经得起真理的检验，眼光要放远大一些，尽可能避免留下遗憾。所谓新闻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求新闻要有理性，要有一定的判断力和准则。新闻史家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反对越南战争并促使越南战争结束这一新闻“经典”，往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新闻理性与社会责任(以“新闻自由”的面目出现)的体现。同时，人们还对70年代“水门事件”的报道津津乐道。在1972-1973年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克服各种阻力，全面揭露了共和党在民主党水门大楼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事件。尼克松总统因参与这一事件而被迫辞职，两名记者写成《总统的全班人马》一书，《华盛顿邮报》因此事获普利策新闻奖，名声大振。其实，美国新闻界反对“越战”，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不是维护越南的利益；报道“水门事件”，则是美国党派斗争的衍生物，也是报业激烈竞争、力求扩大发行量的结果。因此，美国的新闻理性与社会责任是有利害关系的，是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体现。中国的新闻理性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中国新闻界，正在朝着真实、客观、公正、平衡的方向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新闻要有特色在新闻史上别具一格的新闻作品，往往与新闻记者的别具慧眼和敢于报道独家新闻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为天下先，报道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或顺应时代潮流的特殊事件，这是令人景仰的那些“先锋记者”们的追求。著名记者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的新闻实践，就是如此。范长江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上下，现在仍被视为经典之作。1935年，年仅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他的旅行见闻陆续见诸报端：通讯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不久，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范长江充分地表达了他坚决的抗战热忱和对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无比憎恨，也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1936年，政局动荡，战火频繁，范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西部，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扑事变中心，他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陕北之行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回到上海，他发表了震动朝野的系列报道，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范长江是第一个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1936年他作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的西方新闻记者，在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个月的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

闻封锁,扩大了中国工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他的新闻名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938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轰动一时,重印本和翻印本无数。在新时期,在风云变幻的社会转折关头,新闻的独特魅力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1992年2月20日至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8篇“猴年新春评论”和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8篇评论以朴素而有力的语言,阐发了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则详实报道了邓小平同志来深圳考察情景,生动记叙了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再现了一代伟人的动人风采和深邃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国内几乎所有的重点报纸都转载了此文,由此引发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热潮。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不同凡响、激动人心的新闻作品总是新闻价值的高度体现。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幸运地捕捉到能够为之拼搏的重大新闻题材,但求异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却是今天的新闻人应该效法的。平淡中见奇崛,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境界也是令人鼓舞的。在保证舆论导向正确、遵守宣传纪律的前提下,新闻如何“出彩”,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和追求。展望21世纪的新闻事业,我们有理由相信,新闻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力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信息时代人们在依赖信息的同时,更需要对信息进行必要的选择与引导,而这正是新闻事业(包括新闻媒介与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将受到致命的冲击,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将要消失,但我们必须承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国家、政党、军队和警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体现政党、阶级或集团意志的新闻事业就一定会继续存在并影响舆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然而其中总有噪音与不和谐音,需要辨别,以正视听。因此,为中华崛起而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必将是我国新闻事业努力的方向。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